

● 考古与文博

三峡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 考古的新局面和新课题

冰 白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冰 白(1957-), 男, 湖北武汉人,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副教授, 主要从事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

[摘 要] 本文回顾了10年前学界对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考古的认识基础, 检视了近10年来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考古取得的新成果和新认识, 对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遗存的编年序列及文化分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并就此提示出三峡考古新局面下呈现的新的学术课题。

[关键词] 三峡考古; 新石器时代; 商周时期

[中图分类号] K87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4)06-0701-06

—

三峡地区的考古工作局面由于葛洲坝水电工程的建设打下了一定基础, 此基础对整个三峡地区而言是不平衡的, 具体表现为峡区秭归以下段田野考古工作和研究工作较多, 对考古遗存的认识也相对较深入; 而秭归以上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相对较少, 尤其现在重庆所辖的峡江段, 某些局部甚至可以说还是考古的半处女地。

对于基础薄弱地区的考古来说, 建立较完整的遗存编年序列是第一要务。在湖北境内的峡区, 随着朝天嘴、中堡岛、杨家湾、白庙、路家河、官庄坪等遗址的陆续发掘, 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各段的主要遗存基本被揭示出来^①。主要参照江汉地区和中原地区的相关成果, 研究者对不同类别遗存间的相对年代关系也有了大致清晰的认识。而在峡江上段, 巫山大溪、忠县管井沟等地点的发现虽很重要, 但还远远不足以构成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遗存序列。

从人文地理上看, 自古以来峡江显然是沟通江汉平原地区与川东(今重庆所辖地区)及成都平原地区的最重要的渠道。然而, 以往江汉平原地区与川东及成都平原地区的考古工作却开展得极不平衡, 尽管很多研究者都关注着峡江遗存中显示的两地区的文化关联, 但是在当时那种条件下, 三峡考古还不能够就这方面研究内容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10年以前, 考古学界对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考古遗存序列的认识可简要概述如下:

(1)新石器时代此地区最早的遗存被称为“城背溪文化”, 而朝天嘴的早期遗存与“城背溪文化”的面貌较为接近。

(2)此地区继“城背溪文化”之后是大溪文化, 该文化以巫山大溪遗址得名, 但后来发现的遗址都分

布在巫山以下的峡江段及江汉地区。三峡里的代表性遗址如中堡岛、清水滩等。柳林溪、杨家湾、龚家大沟等地点的发现也被一些研究者归入了大溪文化,或被认为是大溪文化早期的遗存。

(3)三峡内所谓屈家岭文化遗存的年代都与京山屈家岭遗址的晚期相当,晚于本地的大溪文化,这类遗存在中堡岛、清水滩、杨家湾等地有发现。

(4)按中原及江汉地区的标尺衡量,白庙遗存的年代被认为处于龙山时代末至二里头文化早期,有人认为它是石家河文化的一个类型。这类遗存与更早的屈家岭文化间明显还存在年代缺环。

(5)三峡内被断为商代的遗存有多处,较丰富的如中堡岛、朝天嘴、路家河等,断代直接参照的是江陵荆南寺等地点的遗存。此外,巫山大昌坝、忠县管井沟发现的重要线索也一直受到关注。已有研究者认识到这一带的商代遗存与成都平原羊子山等地点的遗存有着密切的关联,这表明我们完全有可能通过峡江内的考古遗存去解读江汉地区与成都平原之间的文化联系。

(6)只有秭归官庄坪一处遗存被明确判断是相当于中原西周时期的,但限于当时条件,这种断代的依据还很薄弱。

近 10 年的三峡考古便是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起步的。

二

回顾近 10 年来配合三峡工程建设进行的大规模考古发掘与相关研究,已取得的成果和进展相当喜人,在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考古方面亦是如此。由于大量新资料的涌现,学界对三峡地区古代遗存及文化的认识已大为改观。

以下地点的考古发掘和发现对改变我们认识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巴东楠木园和丰都玉溪两遗址的早期遗存^②,其年代早于大溪文化,其面貌和特征却又不同于所谓“城背溪文化”及朝天嘴、柳林溪发现的早期遗存。

(2)柳林溪遗址的大规模发掘还引起了研究者对以往杨家湾、龚家大沟等地遗存文化性质的反思。

(3)巫山大溪遗址的重新发掘^③,找到了较以往发掘到的更早的大溪文化遗存。

(4)奉节老关庙、忠县管井沟遗址群的发掘,提出了“老关庙文化”、“哨棚嘴文化”等命名。无论如何,这些命名是对某些新发现的遗存类别的归纳。

(5)秭归庙坪遗址早期遗存的发现填补了以往所知的屈家岭文化与白庙遗存之间的空缺。该遗址还发现了明确的西周时期遗存,这从出土的比较标准的西周陶鬲上可得证明。

(6)巫山魏家梁子的发掘,提出了“魏家梁子文化”的命名。发掘者认为其年代约相当于中原的龙山文化时期。

(7)与中堡岛、朝天嘴、路家河商周时期遗存相类似的发现,在奉节以上的沿江地区也有多处见到,如奉节新浦、万州中坝子等地点。

更为重要的是,三峡地区考古遗存的研究背景亦较以前有了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因为四川盆地一系列考古新成果带来的,三星堆、金沙、宝墩、十二桥等重要发掘及研究大体建立了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末至商周时期的遗存编年,并提出了“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等文化命名,一些令人瞩目的遗迹、遗物的出土表明当地商周时期文化与文明的高度发达。在此情况下,作为沟通江汉地区乃至中原地区与四川地区文化的最重要通道,三峡地区考古遗存研究的意义和作用也随之愈益彰显。

三

三峡里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如楠木园、玉溪以及朝天嘴、柳林溪等地点的发现,都还早不过宜都城背溪遗存所处的年代,其性质也难以用“城背溪文化”之名来概括。这些遗存可分两类,特征相近的楠

木园和玉溪为一类;朝天嘴和柳林溪应为另一类。从发现地点上即可看出,前者分布于巫峡以西,而后者分布于西陵峡里。这两类遗存都可能给予新的名称。依城背溪的测年结果,或者两类遗存的绝对年代都不得早过公元前6000年,实际年代甚至不得早过公元前5500年。显然,在此基础上探寻三峡里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亦即探寻上述两类遗存的源头的课题已摆在了研究者面前。

朝天嘴、柳林溪这类遗存与过去曾被看做是大溪文化一部分的杨家湾、龚家大沟等遗存实为同类,此类的年代至少有一部分与枝江关庙山一期、江陵朱家台早期相若。据此可知它亦应早于大溪文化。由此而来的问题是,江汉地区的关庙山一期等遗存的性质是否要重新认识?还有,大溪遗址新发现的早期遗存与这里论及的两类遗存关系如何?简而言之,大溪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其真正源头何在?这些问题也尖锐地摆在研究者面前。

西陵峡分布着屈家岭文化(指以屈家岭遗址晚期为代表的文化)是以往已知的事实,中堡岛的发现表明峡内的屈家岭文化有一定个性,但直到哨棚嘴一类遗存的认出,才使这些个性的由来有了合理解释,三峡屈家岭文化中的花边口侈沿罐等特点来自于哨棚嘴一类遗存。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沿峡江西进而与“哨棚嘴文化”直接接触,两者分野大致在巫山一带,此事实已由考古遗存清楚地反映出来;约略与此同时的另一事实是大溪文化的终结。这些事实为进一步深入探讨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哨棚嘴文化”三者之间关系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此外,“哨棚嘴文化”中所含大量与成都平原宝墩文化相似的成分,又为探明这两种文化间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目前,对“哨棚嘴文化”年代范围的界定还不十分清晰,它和相关的“老关庙文化”名称之间存在种种歧义,又还涉及到对“魏家梁子文化”的认识,这些问题只有进一步的田野工作和仔细研究才能澄清。但这不妨碍研究者去思考这些遗存的来源问题,这些遗存与大溪文化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应首先捋清。我个人看法是:魏家梁子简报所分两期基本可信,其早期年代或与中原庙底沟二期相若,也就是说,魏家梁子早期已晚于屈家岭文化;而魏家梁子晚期陶器一方面出现一些盘口特征等指示其年代已接近或相当于白庙遗存,另一方面不见于早期的高领罐形态却又接近石家河文化同类器,故其具体年代位置还有待进一步确认。目前可大致认为魏家梁子是“哨棚嘴文化”同一谱系的较晚阶段的代表遗存。

庙坪的龙山早期遗存性质不同于魏家梁子遗存,发掘者认为属石家河文化是合理的。这表明,当时的峡江里,依然有东、西两种文化对峙的局面。

白庙遗存基本上可看做是煤山文化石板巷子类型与哨棚嘴—魏家梁子遗存的混合体^④,可能也吸收了当地石家河文化的某些因素,但是否还能将其认作石家河文化的一个类型就成问题了。这也是说明考古学文化分化、重组发展模式的一个典型例证。从忠县中坝遗址的有关资料看,白庙遗存的形成,似乎并不意味着三峡里东、西两种文化并列的局面从此改变,目前巫峡以上与白庙遗存年代相当的有关发现(如忠县中坝和巫山锁龙等),若看做是哨棚嘴—魏家梁子遗存的后续或许更合适,而与白庙遗存的性质仍不相同,这些发现如何定性、定名亦须讨论。白庙遗存的具体存在年代,若按中原标尺衡量,完全有可能是跨着龙山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时期两个阶段的。

四

三峡里过去断在商代或西周的遗存大体可判定以中堡岛和朝天嘴的年代较早,而路家河的年代较晚。从较早的中堡岛和朝天嘴的资料就可看出,这些遗存较之白庙遗存已有了质的改变。如果按以前的认识将这些遗存定位于商代,其与白庙遗存之间似有年代空缺,所以,不排除这些遗存的年代上限有早于商代的可能。

从中堡岛和朝天嘴到路家河,这些所谓商周时期遗存也不能视为同类,虽然有些特征器物如釜类等早晚都沿用,但中堡岛常见的侈沿深腹平底罐在路家河已基本不见了。这说明较早的遗存与较晚的遗存之间特征结构已发生了改变。对较早的遗存和较晚的遗存如何给予命名,仍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

依目前已公布的材料,万州中坝子等地点的发现还只能暂归入中堡岛和朝天嘴之类,这是否意味着此前峡江里长期存在的东西不同文化并列、对峙的局面已不复存在,也是一个值得关注并需要进一步确认的问题。较早一类的具体年代可能跨夏商两代,而较晚一类的具体年代则可能跨商周两代,但已有的发掘成果还不易就此做出确切答案。秭归长府沱遗址的主要遗存基本属于较晚的一类,该地点出土的高和假腹豆可大体断在殷墟早期,且可说明中原王朝的文化此时才第一次直接介入到三峡地区来;另外,清江香炉石遗址的发现也应与路家河遗存视为同类遗存。研究者很早就意识到,这早晚两类遗存都看得出与成都平原的文化遗存有密切关联,由于宝墩、三星堆及十二桥等一系列重要发现,使这种意识更加清晰起来。如果相信成都平原的文化自成一系且源出本土,则峡区内的这些遗存都应是成都平原文化通过三峡向东流变的结果,其形成时间亦应晚于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等。峡区内这些遗存与成都平原最显著的差别是含有大量的釜类器,故不宜用成都平原的文化命名来概括。

以庙坪为代表的比较典型的西周遗存出现于三峡,应晚于上述路家河一类遗存,庙坪出土的西周鬲,年代已是西周中晚期。如果没有年代上的空白,更可相信路家河遗存年代跨入了西周。所谓比较典型的西周遗存在三峡并非独立存在,其间掺入了许多本地的文化因素,直到此阶段,中原王朝的文化直接介入的范围还仅限于巫山以东的峡江段。顺便指出,若将庙坪的发现定在西周晚期,那么以往发掘的官庄坪遗存似应比西周要晚。

五

上文主要就三峡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文化的序列和谱系关系方面的问题作了讨论,从中可看出,一方面近 10 年的三峡考古成果是丰硕的,研究者对遗存的认知水平也已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另一方面,随着新发现、新成果的不断获得,又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和疑问,研究者又面临着新的挑战 and 新的机遇。对三峡考古遗存的发掘和研究工作,已站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上。

三峡考古开始时,学界普遍对探索巴文化怀有浓厚兴趣和较高的期望,经近 10 年的艰苦工作后,客观地说,此问题还不易做出明确的结论。文献史料不足使考古学的探索有很大难度,而迄今考古工作者也未能找到与巴文化或巴文明相适配的中心性聚落遗址。通过文化谱系研究去推定巴文化虽是一途,但用此方法首先需要搞清两个问题,一是是否存在有着独特风貌的考古学的巴文化?二是如果有,哪些是已知的遗存?其年代在何时?即或这两个问题已搞清,因文化发展分化、重组模式的作用,由已知的遗存向前追溯也是有限的。故文化谱系研究的方法有其局限,对用此方法提出的推论应持谨慎的态度。本文所论及的商周时期,三峡地区至少有 3 种以上的遗存类别,其中至少有两类遗存始终受到来自成都平原的蜀系文化的强烈影响,但又始终与蜀系文化不同质。按存在时间和分布地域来推,目前至多只能说它们可能与早期巴文化或“先巴文化”有关。西周以后尤其是战国时的巴文化探索问题,因文献资料略增多,可以史载巴、楚、秦三者关系与考古遗存去对证,但这已超出了本文要谈的内容。总之,对巴文化的深入认识,还有待于新的发掘和研究成果出现。

由于自然原因,峡区内许多地段的微地貌在历史上经历了频繁的变更,致使地下埋藏的很多遗存堆积已不是原生的状态。已发表的资料中,像大溪、庙坪那样有出土成组器物的遗迹单位的地点也明显偏少。这些客观情况,给研究者用层位学和类型学对各地点、各类别遗存进行细致分期增加了难度。因此上文论及的各地点、各类别遗存的分期问题大多还未能很好地解决,已有的分期研究成果也还有待进一步检验。

与分期问题相关联的是断代问题。对本文所谈的三峡内的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很多研究者习惯于使用中原地区文化的相对年代标尺来度量,而且很自然地有追求精细断代的倾向。虽然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我想在目前情况下,以下两点思考或许对认识三峡内遗存的年代更加有利:第一,三峡是沟通四川盆地与江汉地区乃至中原的通道,而江汉地区又是峡江与中原的一个中介,业已建立的江汉地区文

化的年代标尺, 应该在对三峡遗存的断代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断代时由东向西看是符合由已知及未知的认识逻辑的。第二, 在很多遗存的细致分期尚未很好解决之前, 对精细断代的追求所冒的判断失误的风险也很大, 一一对应式的断代可能还不如卡点式的断代稳妥; 文化发展不平衡、参差不齐的情况也是作一一对应式断代时要充分考虑的。

这里谈论的三峡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考古的有关课题, 就整个三峡考古而言, 还只属于其基础建设的部分, 可以直言, 这也可能代表着当前阶段三峡考古的面貌和特点。对各类遗存展开全方位、多学科的系统研究, 还有待于考古人今后的努力。

注 释:

- ① 这些地点以往的主要田野考古资料, 大多收录在: 葛洲坝工程文物考古成果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0年版)一书中。另外, 文物1989年第2期刊有朝天咀、中堡岛的考古资料。又见国家文物局三峡考古队编《朝天嘴与中堡岛》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1年版; 长江水利委员会编《宜昌路家河》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2年版。
- ② 资料尚未正式发表, 参见余西云, 等: 鄂东东楠木园一期遗存发掘。中国文物报, 2001年12月28日; 又见余西云, 楠木园遗址的文化特征。古代文明通讯第6期。
- ③ 参见邹后曦, 等著巫山大溪遗址历次发掘与分期。重庆·2001三峡文物保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3年版。
- ④ 宜都考古发掘队, 湖北宜都石板巷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 1985(11)。又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宜都城背溪。文物出版社, 2001年版。将石板巷子遗存视作煤山文化的一个类型, 参见白云, 关于“石家河文化”的几个问题。江汉考古, 1993(4)。

[参 考 文 献]

- [1] 四川长江流域文物保护委员会文物考古队. 四川巫山大溪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记略[M]. 文物, 1961, (11).
- [2] 四川长江流域文物保护委员会文物考古队. 四川忠县谿井沟遗址试掘简报[J]. 文物, 1962(8).
- [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宜都城背溪[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1.
- [4] 国家文物局三峡考古队. 朝天嘴与中堡岛[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1.
- [5] 湖北宜昌地区博物馆, 等. 宜昌县清水滩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J]. 考古与文物, 1983, (2).
- [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1982年秭归柳林溪发掘的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存[J]. 江汉考古, 1988, (3).
- [7] 宜昌地区博物馆. 宜昌杨家湾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J]. 江汉考古, 1984(4).
- [8] 湖北省博物馆考古部. 秭归龚家大沟遗址的调查试掘[J]. 江汉考古, 1984(1).
- [9]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等. 京山屈家岭[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65.
- [10] 三峡考古队. 湖北宜昌白庙遗址1993年发掘简报[J]. 江汉考古, 1994(1).
- [11] 长江水利委员会. 宜昌路家河[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2.
- [12] 荆州地区博物馆, 等. 湖北江陵荆南寺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J]. 考古, 1989(8).
- [13] 四川省博物馆. 川东长江沿岸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J]. 考古, 1959(8).
- [14] 林 春. 宜昌地区长江沿岸夏商时期的一支新文化类型[J]. 江汉考古, 1984(2).
- [15] 湖北省博物馆. 秭归官庄坪遗址试掘简报[J]. 江汉考古, 1984(3).
- [1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湖北秭归县柳林溪遗址1998年发掘简报[J]. 考古, 2000, (8).
- [17] 吉林大学考古学系. 四川奉节老关庙遗址第一、二次发掘[J]. 江汉考古, 1999, (3).
- [18]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三峡考古队, 等. 忠县谿井沟遗址群哨棚嘴遗址发掘简报[A]. 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
- [19]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峡考古队. 湖北秭归县庙坪遗址1995年试掘简报[J]. 考古, 1999, (1).
-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长江三峡考古工作队. 四川巫山县魏家梁子遗址的发掘[J]. 考古, 1996, (8).
- [21] 吉林大学考古学系. 四川奉节县新浦遗址发掘报告[J]. 考古, 1999(1).
- [22] 西北大学考古队, 等. 万州中坝子遗址发掘报告[A]. 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
- [23] 四川文物管理委员会, 等. 广汉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J]. 文物, 1987(10).

- [24]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等. 金沙淘珍——成都市金沙村遗址出土文物[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2.
- [25]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 等. 四川新津县宝墩遗址调查与试掘[J]. 考古, 1997, (1).
- [26]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J]. 文物, 1987, (12).
- [2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工作队. 湖北枝江关庙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J]. 考古, 1981, (4).
- [28]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等. 湖北江陵朱家台遗址 1991 年的发掘[J]. 考古学报, 1996(4).
- [29]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等. 忠县中坝遗址发掘报告[A]. 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 卷[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
- [30]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 巫山锁龙遗址发掘简报[A]. 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 卷[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
- [31] 宜昌市博物馆. 三峡库区长府沱遗址试掘简报[J]. 江汉考古, 1995, (4).
- [32] 湖北省清江隔河岩考古队. 湖北清江香炉石遗址的发掘[J]. 文物, 1995, (9).

(责任编辑 桂 莉)

New Aspect and New Topic of Archaeology from Neolithic Age to Shang and Zhou Periods in Three Gorges along Yangtze River

BING Bai

(School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BING Bai (1957-),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archaeology of Neolithic Age.

Abstract: Aimed at Neolithic, Shang and Zhou archaeological work in Three Gorge area, in this article, I look back upon the ground on which the old knowledge of ten years ago based, check up on the new achievements and new knowledge in the late ten years and also supply my own opinion about the order and cultural classification of the remains in this time and space. According to this, new important academic subject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of Three Gorge excavation are suggested as well.

Key words: Three Gorge excavation; Neolithic period; Shang and Zhou period